

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御注《道德经》

□ 王皓月

《道德经》是中华文化中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是道家哲学和道教思想的源泉，其中精深的哲理，不仅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智慧，对当今世界也具有重要的启迪。《道德经》虽然只有不到五千字，但是因为其蕴含了深邃的思想，成为了注释版本最多的经典之一。

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帝王注释《道德经》的先例。如梁武帝撰《老子讲疏》六卷，梁简文帝撰《老子私记》十卷等，但这些御注《道德经》没有流传下来。现存的御注《道德经》有四部，即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的御注《道德经》。探究四部御注《道德经》产生的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御注《道德经》的产生与帝王的个人偏好和时代背景有关。

四部御注各自的产生背景

唐朝皇帝是李姓，所以尊名为李耳的老子为祖先。在李氏王朝的推动之下，道教的地位超越了儒教和佛教，位居三教之首。唐玄宗李隆基对道教和老子的推崇更达到高峰，他在登基之初撰有《玄元皇帝赞》一文，称赞老子为“万教之祖，号曰玄元。东训尼父，西化金仙”，是对老子加封次数最多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对道教的喜爱比唐玄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曾令道士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宣扬“君权神授”，相信自己就是天上的长生大帝君。他对道教最大的贡献是下令于政和年间编成了《政和万寿道藏》，这是第一部完整雕印刊行的《道藏》。如此热衷于道教的宋徽宗自然对老庄有所钻研，其《御注道德经》和《南华真经逍遥游指归》的水平是比较高的。

（上接1版）习近平总书记这篇重要讲话，第一次把“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并提。类似这样的论述还有：要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就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等等。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四个伟大”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一点，可以从逻辑和历史两个维度去把握。从逻辑维度看，存在决定意识，客观决定主观，打铁还需自身硬。“四个伟大”的内在逻辑关系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实现中国梦不可能一蹴而就，是十分艰难曲折的过程，要实现中国梦，必须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领导好、进行好这一伟大斗争，就必须推进党的建设，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从历史维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更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进行好“伟大斗争”，需要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所有这些，旨在推进新形势下的“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四个伟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进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怎样看待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进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

马克思说过：“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习近平总书记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理论创新，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

明太祖朱元璋在明朝初建之时崇尚重典，但是效果不佳，让他对政策产生了反思，大臣桂彦良指出“用德则逸，用法则劳”，获得了他的认可。之后，明太祖反复揣摩《道德经》，从中感悟了治国之道，并撰写了御注《道德经》。可以说，明朝初期生产凋敝、社会动荡的局面是激发明太祖从《道德经》中寻求治国理念的直接原因。

清世祖顺治帝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第一任皇帝，当时清朝的统治基础还不是十分牢固，各地反清活动不断，满汉民族冲突依然激烈。清朝统治者为了稳定政权，需要尽快恢复生产，强化统治，增加文化认同。在这种背景之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顺治帝推崇《道德经》了。

正如清世祖所说：“《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于妙，下可以通于微。以之求道则道得，以之治国则国治，以之修身则身安。”四部御注《道德经》是帝王求道、治国、修身的指南，其中很多基本理念是一致的，但每个帝王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理解，进行了富有特色的诠释，这些注释所体现的治国理念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四位君主的共同认识

从共通的方面来看，四部御注《道德经》都认同老子的民本思想，这与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一致。如唐玄宗注解“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一句时说：“侯王贵高，兆民贱下，为国者以人为本基，当劳谦以聚之”，强调了治国者要以人为本。《道德经》还有一些思想以利民为目的，如“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宋徽宗就表示赞同，曰：“圣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绝而弃之，与道同体，则

发展等重大课题，不断根据新的实践推出新的理论。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分析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面临新的实践究竟是什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和聚焦点究竟在哪里？

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到“四个伟大”当中来寻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显然，这里所讲的“四个伟大”，就是时代的呼唤，就是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根本问题。这是因为，从深层次看，“四个伟大”是围绕“需求与供给”“目标与路径”的关系展开的，这涉及理论创新的根本问题。理论创新是“供给”方，时代呼唤、实践要求、党和国家发展需要是“需求”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就是目标，是党、国家和人民的殷切期待，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分别是实现“伟大梦想”的必由之路、精神支撑和政治保障，能满足党、国家和人民的殷切期待。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推进的理论创新，就是建立在“四个伟大”实践基础上的，是从“四个伟大”的实践中生长出来的，是在对“四个伟大”所蕴含的时代课题、根本问题的解答中形成的。“四个伟大”蕴含着党的创新理论形成的实践逻辑、现实逻辑。“四个伟大”是党的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和聚焦点。比如，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使中国强起来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新发展理念”，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体方略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良好国际环境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努力建设世界上最强盛的政党”为基本内容的“坚定政党自信”，等等，都植根于“四个伟大”实践之中。这些理论创新成果，都是从“四

各安其性命之情，其利博矣。”其中认为抛弃圣智，与道同体，才能广利天下。明太祖则曰：“治国务欲民实，无得重敛而厚科，若重敛而厚科，则民乏用矣。民既乏用，则盗贼之心萌，盗贼之心既萌，将必持戈矛而互相戕，是谓难治。”认为要让百姓生活充实，否则会引发盗贼之心，一旦这样国家便难以治理。

以民为本的统治方法必然需要与道合一，实行无为而治。《道德经》中所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就是对这种政治之道的概括。无为而治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按照自然的规律行事，不进行过度干预。唐玄宗注曰：“人谓王也，为生者先当法地安静。既尔又当法天，运用生成。既生成已，又当法道，清静无为，令物自化。人君能尔者，即合道法自然之性。”宋徽宗曰：“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耳。无以扰之，民将自富。”如果君主治国以统治者自居，肆意妄为，则国家将会危亡。

老子说其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简朴是《道德经》推崇的理念，这种反对奢靡的观点也影响着帝王的治国理念。虽然宋徽宗后来在蔡京的引导下生活逐渐走向奢侈，但是在张商英任宰相时期，他还是注意节俭的。宋徽宗也注曰：“天地常俭，能常侈常费，而況於人乎？”《道德经》还有一个特点是贵生而恶杀，指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这促使帝王谨慎地看待用兵，不到不得已之时不诉诸武力解决。宋徽宗注曰：“三军五兵之运，德之末也。未者，古人有之而非其所先。以道佐人主者，务本而已，故不以兵强天下。”认可不能优先用武力统治天下。清世祖则注曰：“用兵乃王者之不得已也。夫兵者，不祥

个伟大”的实践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多是为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而提出的。因此，要围绕“四个伟大”实践拓展理论新视野，基于“四个伟大”实践，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创新理论作出新概括。

“四个伟大”：制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行动纲领的基本遵循

我们需要从走向“强起来”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来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这篇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如何为这一新的发展阶段制定科学有效的行动纲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能否提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如何制定科学有效的行动纲领？行动纲领主要包括政治上和实践上的纲领。其中在政治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要明确宣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从政治上认识和把握行动纲领提供了方向指引，是从政治上制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行动纲领的基本遵循。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属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他还指出，我们要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在这里，高举“一面伟大旗帜”、牢固树立“四个自信”、提出“三个新”、推进“两大布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等等，都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旗帜和道路进行的明确宣示，表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鲜明政治

之器，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实际治国中的得失

除了上述共通之处，不同的御注《道德经》也各具特色。宋徽宗的文学修养很高，他的《道德经》注释不仅思想内涵丰富，而且文字流畅，唐玄宗的注释也颇有见地。相比之下，明太祖文化修养一般，其注更侧重有感而发，而清世祖作为少年之时注《道德经》，其感悟似乎还不够深刻独到。

此外，四部御注《道德经》结合了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形势。北宋中期之后，代表革新势力的王安石和代表守旧势力的司马光围绕变法引发了广泛的党羽之争。宋徽宗时期独揽大权的蔡京等也以推行新法的旗号卖官鬻爵、增税加赋。因此，宋徽宗对变法产生反感，注曰：“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惑。是以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认为治国不能经常变法，要崇尚清静，这显然是与北宋当时混乱的政治状况有关。

虽然四位帝王注释了《道德经》，但是很难说他们完全实践了其中的治国理念。唐玄宗时期发生了安史之乱，成为了唐朝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宋徽宗在后期也沉湎于腐化奢侈的生活，直到宋钦宗时期发生了靖康之变，金兵攻占东京，徽钦父子和大量皇族、大臣被金人俘虏，北宋灭亡。而明太祖和清世祖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则巩固了其统治基础。因此，最重要的是做到“知行合一”，对于《道德经》中的治国理念，不仅要注释，更要真正实践。同时，还应该看到王朝的兴衰受历史发展的制约，并非完全由帝王个人的治国理念所左右。

态度。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主要属于具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想一帆风顺推进我们的事业，想顺顺当当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那是不可能的。可以预见，在今后的前进道路上，来自各方面的困难、风险、挑战肯定还会不断出现。”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就要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关键在人，就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如何“进行准备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属于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们要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重要论述告诉我们，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前后接续的奋斗历程，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量的积累，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质的飞跃。我们必须妥善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属于怎样为“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伟大斗争”提供政治保障问题。要真正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好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就必须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因此，“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伟大斗争”是“伟大工程”内在根据和推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进一步把党建设好，确保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成功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作者系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副教授 长兼科研部主任）



一篇《岳阳楼记》，让我们记住了范仲淹的名字，也记住了他那句志存高远的豪言壮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事实上，范仲淹在政治上的作为，丝毫不比他在文学上的造诣逊色。尤其是在选贤任能方面，范仲淹既有理论，又重实务，他所举荐的人才，数量多，质量高，像曾巩、尹洙、韩亿、富弼、汪洙、苏麟、狄青、张载、苏舜钦、雷简夫等一代名流，都出自他的奏举。范仲淹不仅能出以公心提拔后起之秀，而且能因人制宜，悉心点化那些可塑之才，使之走出误区，从而前程更加远大，造就更加辉煌。

北宋时期长安学子张载，天资聪颖，年少早熟，满腹经纶，志向不群。当时，西夏经常侵扰西部边境，朝廷每以赏赐贵重物资换取短暂和平，这让张载心潮难平。21岁那年，张载写成《边议九条》，向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陈述，打算组建民团，收复失地，保家卫国，建功立业。范仲淹对这位热血青年的满腔热情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从他的谈吐中觉察到，张载儒学功底扎实，若能专精，可成大器，领兵打仗并非其强项，于是劝勉他专注于儒家学的研究，将来必有建树。

张载听了范仲淹的劝告后，回到家乡横渠，专心致志地攻读儒家经典，但仍觉不足，转而遍览释道两家学说，经过十多年对照印证，融会贯通，终于悟出了儒释道互通互补的道理，逐渐建立起独立的学说体系，并在关中一带教书讲学，以德育人，从而使学者辈出，民风为之一新。后世尊称其为“张子”，与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合称“北宋五子”。他所创立的“关学”，从北宋到清末，延续了800余年，影响深远。明代学者王阳明评价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至今仍被人频繁引用的传世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出自张载胸臆。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从人才成长的轨迹看，一个人要怎样才能转化为智能，学业外化为功业，发展方向的选择至关重要。作为人才个体，他可能确有慧根，确有潜质，但也有可能不知自己是块什么料，最适合做什么。抑或是，知道自己是什么料，却不知往哪个方向努力，激发自己的潜能，提升自己的段位，发挥更大的作用。若有慧眼人从旁悉心点拨，使之茅塞顿开，重新校正目标与支点，精准发力，从而一飞冲天，比提携他谋得职位更有意义。历史上有不少可塑之才，都是经高人点化后如虎添翼、功成名就的。

北宋康定初年，西北边事吃紧，范仲淹以经略安抚副使身份，同韩琦一道被派往陕西。其间，听说当地有

范仲淹悉心点化可塑之才

□ 王兆贵

位叫狄青的军吏，武艺高强，勇猛果敢，打起仗来身先士卒，西夏兵闻风胆寒。范仲淹督军伊始，正需要这样的人才，立即召见了他们。一番交谈之后，范仲淹觉得他的确是难得的良将之才，于是就问他读过哪些书。狄青出身低微，家境贫寒。16岁那年，因兄长与人斗殴，顶罪受罚，刺配充军。狄青擅长骑射，先被选做散直（骑兵侍卫官），后来充任延州指使（骑兵教官）。说来惭愧，哪里读过多少书呢？范仲淹年长狄青19岁，听了他的经历，颇为同情和理解，便勉励他说，领兵之人若不懂经史，顶多只是匹夫之勇。并送他一部《左传》，指点他应从哪里入手研习古籍。狄青自此折节读书，兵法方略愈益精进，指挥能力和治军水平一再提升，从而文兼武备，智勇双全，累建战功，官至枢密副使。

“点化”一词，本是道家、佛门用语，原指神灵施展法术使人或物成仙，后指高人通过启发开导使人悟道。在现实社会中，尽管不存在仙人指路，也不可能点石成金，但就人力资源开发的绩效而言，点化之功优于提携之力。发现和举荐后起之秀固然重要，但若能根据各类人才的先天资质，帮助他们认清自己的优势所在，并在今后发展方向和方式方法上指点迷津，比起直接提拔使用，更具前瞻性、再造性和长远性眼光。从这个意义上说，范仲淹的育人之道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